



醒木惊天连阔如

■ 簑笠翁

周总理称赞：“一人就是一台戏”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北平演艺界，共有三个同业公会：国剧（京剧）公会、评剧公会、曲艺公会。

北平曲艺公会全体通过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，大家一致推选连阔如为北平曲艺界惟一代表，去出席在中南海召开的首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。

当军管会所属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刘乃崇先生，向大家宣布选一位北平曲艺界代表参加全国文代会时，许多年迈的曲艺家在悄悄拭泪。他们太激动了，旧社会被看作“下九流”的艺人，如今也挺身而出前往国家级的代表会议，并和国家领导人共议文艺大事，这实在让人感慨万千。

“全国文代会能让咱说书唱曲的人参加，和人家念书的、写诗的、演戏的人在一起？这会是真的吗？”——许多曲艺艺人都不大敢相信，从前在天桥拉场子撂地卖艺的人，被人看不起的人，会有今天这风光和福分。

从历史上看，中国人向来看不起演员，不礼貌地称之为戏子。更有顺口溜说“王八戏子吹鼓手”。戏子被认为从事贱业，与皂隶、媒婆等而类之，连科举考试都不允许参加。以至一般人家都不愿意让子女学表演。我们实在弄不清楚为什么旧时代的人看不起艺人，艺术表演可是需要天才的啊？或许，并不是所有阶层的人都瞧不上戏子，唐朝有为琵琶女作长诗的白居易，五代十国有为宫娥慨叹“教坊犹奏别离歌”的李煜，现代则有为柳如是立传的陈寅恪，他们对伶人的平等、关爱、怜恤之情，代表着有教养的中国文化人的素质。事实上，知识、

教养程度越高者，越不会看低艺术和艺人，相反，文化教育程度越低者，越不懂得艺术的高贵与艺人的可敬。

第一届全国文代会，于1949年7月2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到会并讲话。

文代会上的曲艺界代表为数不多，但代表着全国近10万曲艺艺人。会上，戏曲、曲艺的代表提出要求成立国家级专门学会，经主席团研究决定成立戏曲和曲艺两个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备事宜。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于7月22日成立，推选王尊三为主任委员，连阔如和赵树理为副主任委员。

京剧界的代表有梅兰芳，评剧界代表有赵富成，话剧界代表有曹禺，舞蹈界代表有戴爱莲，音乐界代表有马思聪，电影界代表有蔡楚生，文学界代表有郭沫若，翻译界代表有傅雷，民间文学界代表有赵树理……而曲艺界代表有连阔如。

曲艺艺人与国家领导人一道出席国家级文艺代表大会，这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，也是第一次！曲艺家们就憋足了劲儿，想在大会上、众人前好好地表现一下。以连阔如率队的曲艺家代表们，身穿赶制出来的灰布衣裳——男士中山装、女士列宁服，整整齐齐，在许多其他艺术门类代表们长衫、大褂的衬托下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从曲艺公会借钱做的衣服，但穿着效果很好。

戏剧评论家刘乃崇认为，“1949年作为代表参加全国文代会，是连阔如一生的转折点”。

连阔如在大会上，说了一段自编的新评书《夜渡乌

江》。他感到新旧社会两重天，他感谢共产党、感谢人民，心里有话，不吐不快。

醒木惊堂，嗓音高亢，连阔如运足气力，把那段红军征战乌江边的往事说得有疾有缓、有声有色。说书人的表情、语言、动作所表达的气势，突兀如峭壁千寻，跌荡似倒海翻江，足令天地动容，日月改色。

连阔如的好友曹宝禄（单弦表演大师），在他的回忆录《曲坛沧桑》中，记下了当时的场景：“他配合着表述，还模拟了红军英雄人物与狂风巨浪搏击的动作，给人以神完气足、火爆有力、酣畅淋漓的感受。他整整说了一个多小时……”

周恩来显然被连阔如的评书魅力所感染。他在作报告时说：“现在有很多文工团的演员同志们，要求领导给他们购置钢琴、小提琴、大提琴、洋鼓、洋号……这些乐器都为你们准备了，可是目前还不能发给你们。因为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。我们传统的大锣、大鼓还不能丢掉。这几天开会期间，你们要向他们学习（指曲艺席）。他们有的只是一把弦子，有的是一面鼓，他们就唱起来了。北平刚刚解放几个月的工夫，他们就排练出那么多新的节目来，这很了不起啊。”

周恩来又说：“方才连阔如说的那段评书，一人就是一台戏。他只用一块方木头（醒木），往桌上一拍，就讲起红军长征《夜渡乌江》的故事，并受到大家的欢迎，可见曲艺是一支轻骑尖兵。你们每个文艺团体的同志都要向曲艺界的同志们学习。”

连阔如一生到过无数的书场说书，惟有这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表演，令他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。不光是因为国家领导人在场，也不止是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看得比生命更宝贵的评书艺术，能够被国家的主流文化所承认和接纳，并且在崭新的一个历史时代开始的时候，拥有了美好的发展前景。

《夜渡乌江》的评书段子不长，只有个把小时，但是，它在中国曲艺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，承前启后，衔接起新旧两重天、两个时代。《夜渡乌江》为一代评书艺人，赢得了在主流媒体的话语权，利在当时，福泽后世。而连阔如勇于接受新事物、主动适应新时代的做法，

的确成为当时曲艺界甚至整个文艺界的表率。

前门箭楼上，带头表演“新曲艺”

解放初期，北京的戏剧和曲艺还没有“分家”，属于同一“行当”，在唱新戏、说新书方面，显然是戏剧界人士占先，他们很容易地从传统戏剧剧目中找到适合新社会的作品，如京剧《三打祝家庄》、《逼上梁山》等，拿来就演，与革命时代的氛围相合拍；可评书就不同了，《水浒》虽可说，其中封建迷信的糟粕不少，一般说书人不知该怎么说出新意来。带头迎接挑战，闯过时代变迁这一关的非连阔如莫属，不光是他的评书功夫老到，还由于他知识渊博，头脑灵活，善于接受新鲜事物。

连阔如把刚学来的社会发展史知识、阶级分析方法、唯物论和辩证法，都融合进评书《水浒》的人物与事件的评点中，像模像样，不觉牵强。从前，武书文说听说过，可旧书新说却未闻，连阔如是中国说新评书的开山之人。连阔如自己说：“将《水浒》的内容，加以批评分析再说出来，像宋江立场不稳希望招安的讲法，解放以前我不会这样说的。”那时常听连阔如说《水浒》的人，还是一直赞叹：“连先生不止是说事件本身，而且对当时的历史背景、官制、礼节、生活习惯、民间风俗、地理山川以及武术拳脚、战争场面，都讲得头头是道，听得出他的历史知识、社会经验非常丰富，听了真长见识。”连阔如不仅从新的角度、用新的观念说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，他还率先自编自演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新评书段子，实地采访、收集资料、写下日记，准备创作一部完整的“长征”大书，但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，毁灭他费尽心血创作的作品。

连阔如说新书的场地，一是前门箭楼的大众游艺社，二是广播电台。当时北京新的曲艺场所，还有前门小剧场、西单游艺社、大众剧场（原华乐戏院址）等。

1949年10月，前门箭楼上的大众游艺社成立，连阔如任社长。如今，许多老曲艺家还能记得当年，在箭楼上卖票，演出的情景，每天有大鼓、单弦、快板、相声等新曲艺表演，大轴节目就是连阔如的评书。在大众



游艺社成立大会上，不少男女演员穿着解放军军装，显得英武、神气；也有些老演员还是着一身长袍大褂，也透着喜庆，大家合影留念。连阔如曾在电台播讲了新改编的评书小段《芒砀山刘邦起义》《陈胜吴广揭竿起义》，还改编了作家赵树理的小说《李有才板话》《三里湾》，以及原创的新评书《夜渡乌江》《飞夺泸定桥》《强渡大渡河》《智取娄山关》等，为广大听众所津津乐道，并重新整理了长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《东汉演义》……连阔如和广大正直的艺术家、民间艺人一样，以朴实的感情，热爱新中国，拥护新政府，对新生活充满美好向往，他说：“说坏书或是把好书说坏了，就会阻碍人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，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危害作用。”他因身体力行地创作、表演新评书，成为整个曲艺界的带头人。

当时，连阔如做监事的北平曲艺公会，共有600名艺人，三分之一为文盲，要完成新政府提出的创造“新曲艺”的工作显得很棘手，连阔如便向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艺部旧剧处的刘乃崇建议：“要在曲艺界开展扫盲工作。”曲艺艺人扫盲班很快就成立了，连阔如还联络了几位曲艺艺人来义务授课。这些只因曾交不起学费而读不了书的艺人，谁不愿意免费受教育呢？授课时，教室坐得满满的，人人珍惜这个迟来的受教育的权利。文化知识一时间不可能掌握，但艺人们竞学新词却全无阻碍。几位穿着列宁装的文化干部，整天在各个曲艺演出场所巡视，手里拿个小本本，不停地记录，他们有权决定税收额度。如果节目内容比较“严肃、干净”，就可免去10%到30%的税，如果节目是歌颂共产党、新中国和新生活的“新曲艺”，就可以将税全部免掉。减免税还只

是赢利多少的问题，而“巡视员”掌管着安排艺人演出地点、时间、场次的权力，同时握有枪毙节目或禁止演出的市场生杀大权。

“扫盲班”开办不久，“北平市戏曲、曲艺讲习班”也开学了。据戏剧评论家刘乃崇回忆，参加者为京剧、评剧、曲艺演员共450多人，其中曲艺演员占半数。讲课的有剧作家田汉、戏剧家马少波、导演欧阳予倩等。第一期讲习班结业时，连阔如回顾了自己40多年的生活经历，说他在26岁以前曾“卖卜为生”，等到觉悟那是迷信骗人，才发愤改学说评书。20多年间，在书馆和电台，他的听众达数十万人，现在以曲艺代表资格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，对于自己转变思想，改革旧艺术内容，有很大帮助。他表示，愿意以自己的经验，在今后组织不同的业务小组，和大多数同业人士一起创作新曲词。后来在连阔如组织的两期讲习班上，参加学习的曲艺艺人达到了533人，约占曲艺艺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报纸报道：“曲艺界由于该会负责人连阔如、曹宝禄等人的积极领导，起带头作用，所以表现得最好。”

人们的穿戴是新的，口号是新的，曲艺节目的词是新的，一切都是新的，就连解放军军管会的文化干部对艺人的称呼也一样新鲜——“文艺工作者”，艺人们听着舒服，品着有味，觉着温暖。

在连阔如的带动下，曲艺艺人在前门“箭楼曲艺厅”每天演唱新曲艺，又和新华广播电台合作，每天中午用固定时间播唱新曲目，前后坚持了三年，扩大了新曲艺的影响。评书家赵英颇等开始播讲《一架弹花机》《罗

汉钱》等新评书，曹宝禄演唱了新鼓曲《新五圣朝天》、《三勇士推破船》，关学曾推出了新琴书《小姐俩拾棉花》，顾荣甫、尹福来、魏喜奎等表演了新单弦、新梅花调《大生产》、《解放军横过小西天》、《李大成救火》等。京韵大鼓“少白派”的创始人白凤鸣，创作了一篇新鼓词《1950年新年献词》，全文发表在元旦那天的《新民报》上。

新曲艺产生的心灵动力，使艺人们获得了他们从未感受过的荣誉感。几十年后，当曹宝禄先生在晚年撰写回忆录时，还清楚地记得欧阳予倩讲课，引用了周恩来在全国文代会上说的话：“对于戏曲和曲艺演员，在旧时代是爱好他们，却侮辱他们，今天呢，在新中国，我们要爱好他们，就要尊重他们。”

在新社会受尊重的不仅是曲艺艺人，还有曲艺本身。

翻阅北京市文联大事记，连阔如的足迹依稀可见。

1950年2月3日，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办的《大众文艺通讯》创刊，创刊号上发表的有王亚平的《创刊词》，周扬、赵树理、田汉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，苗培时的《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筹备经过》……连阔如的《我对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希望》等。

5月17日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厅，召开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发起人大会。丁玲、王瑶卿、王亚平、艾青、李广田、李伯钊、沈从文、连阔如、第世荣、张恨水、齐白石等133人出席。文化部副部长、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邓拓应邀到会讲话。老舍作了《让我们团结起来》的讲话。艾青、欧阳予倩、李伯钊、王亚平、连阔如、徐悲鸿、赵树理、程砚秋、凤子、老志诚、李广田、尚小云、苗培时、胡蛮、王松声、焦菊隐、齐白石、曹宝禄、俞平伯、田间、罗常培、周巍峙……35人被选为北京市文联筹备委员会委员。

同日，北京市文联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，推选老舍、李伯钊、赵树理、王亚平、凤子、王松声、苗培时、连阔如、端木蕻良等11人为筹委会常委。

5月19日，北京市文联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。老舍、赵树理、王亚平、凤子、王松声、苗培时、连阔如、端木蕻良、胡蛮、张梦庚10人出席。经研究决定：一、北京市文代大会于28日在劳动人民

文化宫举行。二、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、起草委员会、提案整理委员会；推选老舍、赵树理、王亚平、杨振声、尚小云、欧阳予倩、连阔如、祖田工、胡蛮、老志诚、徐悲鸿、金紫光、李伯康、戴爱莲、田方等16人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。

6月5日，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召开第一次理事会，推选丁里、王亚平、王松声、田间、田汉、老舍、老志诚、李伯钊、李广田、余世光、金紫光、周巍峙、祖田工、洪深、胡蛮、马可、连阔如、梅兰芳……25人为常务理事。组织联络部部长李广田，副部长王松声、连阔如……

11月23日，北京市文联召开抗美援朝文艺作品座谈会。王亚平主持，汪刃锋、卞之琳、方成、汪曾祺、胡蛮、连阔如、杨振声、凤子、臧克家、赵树理、罗常培等26人参加。

1951年3月12日至5月底，以廖承志为总团长，陈沂、田汉为副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总团赴朝，北京文艺界有23人参加了由部分曲艺杂技演员组成的“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”，领队张辅臣，队长连阔如，副队长曹宝禄，演员有高元钧、侯宝林、郭启儒、魏喜奎、高凤山、孟宪友、孙砚琴、尹福来、顾荣甫、金业勤三兄妹等。

1952年11月26日，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市人民出版社，联合召开通俗文艺读物编写座谈会，宋匡我、连阔如、方白、张恨水、陈慎言、孙玉奎等40余人出席。老舍主持会议并讲话说：全国各地开展速成识字运动以后，广大学员迫切需要通俗文艺读物来巩固学习成绩，希望通俗文艺作家们担负起这一伟大任务。市文联愿尽力协助作家解决一些创作上的困难。与会者一致认为，编写通俗文艺小册子，是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的具体表现。

12月17日，北京市文联举行春节文艺创作座谈会。老舍强调，新中国一天天在迅速迈进，群众文化生活一天天在迅速提高，我们写作品，也要求在质上更提高一步。连阔如、张恨水等40余人到会。

（连载十二）

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）

（责任编辑/李玉）